

創造社的理想社會

• 潤 華

1921年創造社成立，時值五四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之際。長期以來，我們習慣把創造社看作一個文學團體，這使我們對有關創造社的一些文化現象做了簡單或者片面的處理。創造社緣起於創辦一個純文藝刊物的願望，《創造季刊》的出版預告還冠以「純文學」的標誌，而創造社留下的大量創作與評論也足以構築一個文學流派。但是，如果整體地、全面地考察它以出版為依託所從事的精神文化活動，就會發現他們的精神觸角其實已遠遠地伸出了文學以外。在創造社的出版物中，包括了物理學、生物學、海洋學、社會學、數學等眾多學科。1928年預告的「社會科學」叢書，則主要是有關社會主義、唯物論、歷史唯物主義的著作。〈創造日·宣言〉宣稱：「我們想以純粹的學理和嚴正的言論來批評文藝、政治、經濟。」^①1925年刊行的《洪水》就是一種綜合性刊物，創作、評論完全淹沒在各種文化批評、政治評論甚至一些宣言、口號之中。1926年3月出版發行的《創造月刊》繼續了這種趨勢，直到1928年創刊的《文化批判》則徹底地成了從事「文化批判」的非文學刊物了。可見，創造社的精

神視野一直沒有局限於文學，而是向着更廣泛的思想文化領域努力拓展。因此，把創造社的歷史概括成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精神文化事件，要比把它看作一個單純的文學社團有意義得多。

一 創造理想社會是基本價值取向

創造社受胎於1918年郭沫若與張資平在日本博多灣的一次談話。當時張資平從國內回到日本，歎息「中國沒有一本可讀的雜誌」，「甚至《新青年》也很膚淺」，兩人便醞釀在國內創辦像日本那樣的純粹的科學^②雜誌和文藝雜誌^③。幾年以後，在郁達夫、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田漢等幾位同人的努力下，《創造季刊》在上海創刊了。

《創造季刊》創刊號有一首序詩曰〈創造者〉，可以說是「創造者」們赤誠的內心獨白：「我幻想着首出的人神，／我幻想着開闢天地的盤古。／他是創造的精神，／他是產生的痛苦。／……／本體就是他，上帝就是他，／……／他從他的自身，／創造個光明

在創造社的出版物中，包括了物理學、生物學、海洋學、社會學、數學等眾多學科。1928年預告的「社會科學」叢書，則主要是有關社會主義、唯物論、歷史唯物主義的著作。可見，創造社的精神視野一直沒有局限於文學，而是向着更廣泛的思想文化領域努力拓展。

創造一個美好的理想社會，不只是創造社同人創辦雜誌、從事文化事業的宣言，而且亦是他們內心深處的基本精神信仰和價值取向。郁達夫、郭沫若的「自我小說」表達個人一己的情緒和體驗，有着純粹的私人化傾向。然而，這類小說也閃爍着或者直接構成了一個基本主題，即呼喚一個富強的民族國家或者美好的理想社會。

的世界。」這預示了創造社同人創辦雜誌的精神指歸——創造一個美好的理想社會。1924年在《洪水》周刊上，周全平寫下〈撒但的工程〉作為刊首語。他幾乎用宣言的形式，滿懷激情地重複了上述主題：「我們要定下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一切社會的醜惡；我們要定下我們的要求，我們的要求是一切醜惡的破壞，沒有調和，永無妥協的破壞！我們要憑着良心的指揮，永遠為正義與真理而戰！待把穢濁的塵寰依舊變成純潔的白地，再來創造出美善偉大的世界。」④

這些發刊詞之類的文字不僅僅暗示了一種雜誌、一個專欄的創辦宗旨之所在，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創辦者同人內心裏飄蕩的那面精神信仰的旗幟。我們往往認為創造社所標榜的「創造」二字乃是其內心裏供奉着「藝術之神」的緣故，實質上他們所敬仰、所頂禮膜拜的，卻是一個「地上的天國」、一個完美的理想社會；藝術或文學只是一架搭載他們直奔天國的馬車。

創造一個美好的理想社會，不只是創造社同人創辦雜誌、從事文化事業的一個宣言，而且亦是沉積在他們內心深處的基本的精神信仰和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浸潤在他們的思想、情感和想像之中，成為他們從事文學創作以及其他文化活動最內在的制約力量。

創造社的小說作品要以郁達夫、郭沫若的「自我小說」最具代表性。他們塑造「自我」形象，直接敘寫身邊的「小事」，表達個人一己的情緒和體驗，有着純粹的私人化傾向。然而，就是這類小說，也閃爍着或者直接構成了一個基本主題，即呼喚一個富強的民族國家或者一個美好的理想社

會。郁達夫的成名作《沉淪》，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主人公一方面用一種飽含憂鬱、傷感、愧疚甚至絕望的語調傾訴着個人幸福生活的不可得，另一個方面卻把個人與國家聯繫起來，滿懷道德熱情地表達了對民族國家富強的渴求。特別是小說的結尾，顯得相當地突兀和富於歷史特色：「『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⑤

郭沫若在寫於1923年的小說〈月蝕〉中，平靜地講述了一家人去看月蝕這樣一件平凡小事。然而，就在這樣一件小事的敘述過程中，自身經濟境況窘迫、國家積弱不振、外國在華勢力膨脹、孩子基本需求無法滿足等種種身外因素，頻頻刺激主人公「我」的脆弱的心靈。「我」一方面通過對故鄉的美好想像來尋找某種慰藉，另一方面則直接呼喚着「在這個亞當與夏娃做壞了的世界當中，另外可以創造一個理想的世界」⑥。

成仿吾的代表作〈灰色的鳥〉以及田漢發表在《創造季刊》創刊號上的劇作〈咖啡店之一夜〉，都是講求情節發展的敘事作品。相對來說，作者在作品中的介入更為複雜、隱蔽。他們的基本價值取向在這類作品中演化成一個敘事模式，即「壓迫—抗爭—創造（理想社會）」。
〈灰色的鳥〉的主要人物丁伯蘭身受宗法制度的迫害，又適逢暗戀的對象因貪圖錢財和地位而離去，因此完全為一種悲哀的情緒所籠罩，有着強烈的厭世傾向。但他最終還是到了「現世的一個小小天國」，即「『由教育到心的改造！』墮落了的現在的人們，把他們作為不曾生存的罷！我們祖國與全人類的真的光明，還是要我們犧牲一切去創造。我雖然這般

弱小，我願把我的全身心，往這方面做去。」⑦〈咖啡店之一夜〉寫酒店侍女白秋英因貧窮與地位低下而被從小青梅竹馬的暴發戶的兒子李乾卿所拋棄。酒客林澤奇是一個學生，家裏貧困，為了替老父親還債而被迫接受父親定下的婚事，幾乎要消沉下去。兩人在酒店中奇遇，互解心事後，決心「為了祖國人民的苦難」，「勇敢地活下去」。這裏，「創造」的尾巴儘管已經隱去，但是情節的邏輯卻暗示着故事朝着「創造一個理想社會」的方向發展。這類作品有着明顯的主觀演繹的痕迹，在這種非常直露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發現，創造一個理想社會是創造社同人的最終關懷。

郭沫若的《女神》是創造社詩歌創作的代表，集首〈女神之再生〉一詩凸現出《女神》的一個基本思想：「我們要創造個新鮮的太陽」是「再生之女神」的人生要義，她們要在「創造」中實現全部的人生價值。女神們這種救世精神和「創造」的理想，是貫穿《女神》的一條基線。譬如〈爐中煤〉抒發一種強烈的愛國情緒，抒寫主人公想像中的國家是一個年青女郎，而「自我」則可以像爐中煤一樣燃盡，可見「國家」、「民族」在詩人心目中居於至高無上的位置。〈浴海〉一詩則直接呼喚着「新社會的改造」的主題：「趁着我們的血浪還在潮，／趁着我們的心火還在燒，／快把那陳腐了的舊皮囊，／全盤洗掉！／新社會的改造／全賴吾曹！」⑧

以上作品的內容，代表了創造社文學創作的主導面，而創造社同人「創造一個理想社會」的精神追求，強有力地制約着這些作品的主題、結構以及情感流向。正因為如此，創造社的作品在當時的文壇呈現出特別的色彩。以往學術界用「浪漫主義」一詞概括創

造社的文學特徵並不圓滿，因為擅於抒情、重視想像的文風是與它的救世熱情和道德衝動分不開的。當時，魯迅與文學研究會成員及其他文風相近的作家的創作原動力，同樣也來自一種拯民濟世的願望，不過他們把這種願望寄託在對現實和歷史的思考之中，創造社則憑着單純的想像和熱情在作品中構築着一個虛幻的夢。

二 理想社會的完美無缺特徵

有研究者認為創造社是青年文化的代表⑨，理由是創造社同人在初涉文化界時都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這種概括也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創造社同人對社會、對個人沒有來得及進行冷靜地思考，其理想中的民族國家與社會形態完全建立在想像和熱情的基礎之上，「完美無缺」是其根本追求。

創造社同人對舊世界持一種徹底棄絕和全面摧毀的態度，他們追求一切都重新開始。郭沫若筆下的「鳳凰」之所以「涅槃」，是因為整個宇宙都成了「屠場、地獄和囚牢」：「我們飛向西方，／西方同是一座屠場。／我們飛向東方，／東方同是一座囚牢。／我們飛向南方，／南方同是一座墳墓。／我們飛向北方，／北方同是一座地獄。」鳳凰更生所帶來的是整個宇宙的更生，是「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⑩。創造社同人所擁有的，正是這種鳳凰涅槃的心態。《創造季刊》創刊號的封面畫也形象地展現了創造社同人告別過去、追求新生的偉大理想，其畫面簡潔，創意鮮明——一個即將生產的孕婦和一艘在早霞映照下駛出海面的輪船，構成了「創造」

創造社同人對舊世界持一種徹底棄絕和全面摧毀的態度，他們追求一切都重新開始。《創造季刊》創刊號的封面畫也形象地展現了創造社同人告別過去、追求新生的偉大理想。

創造社同人心目中理想社會的「完美無缺」的特徵，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內容：其一是科學的倡明和高度的物質文明；其二是絕對的社會平等；其三是充分的道德完善。

的主題，整個畫面有着生意盎然的氛圍以及恢宏闊大的氣勢，喻示了「創造者」對美好未來的信心。還有，《洪水》周刊的命名起初就是來自聖經的故事。上帝為了洗滌人間的罪惡，使洪水泛濫在地上，要把地上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全部毀滅。創造社所幻想的，正是這種救世主的角色和功能，他們要像上帝一樣去破壞和創造。

創造社同人心目中理想社會的「完美無缺」的特徵，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內容：其一是科學的倡明和高度的物質文明。五四「新青年」們提倡「科學」和「民主」，其中科學仍舊毫無保留地受到創造社同人的尊崇，我們隨處可以發現他們對科學的禮讚。成仿吾在貶損當時的國學時宣稱：「科學不僅為我們的素養最緊要的命脈，而且是恢復我們的生命力之唯一的源泉，我們當對於科學維持我們的信仰」^⑩。郭沫若稱讚科學是「救濟全世界的福音」，為「利用厚生之道非仰之於科學不可，啟發智能之途亦非仰之於科學不可」^⑪。創造社同人不僅僅提倡和呼喚科學，在推廣科學方面他們還做過一些切實的工作。1918年，他們就有過創辦一種純粹科學雜誌的意圖。1923年創造社出版了一套科學叢書，其中有成仿吾的《漩轉汽機》、《工業數學》、張資平的《海洋學》、《地球史》。他們在編輯這套科學叢書時還有過周密的考慮，他們的目的是在於提高國內科學書的程度^⑫。「創造日」專欄還發表過有關科學的文章，諸如周全平的〈讀《科學大綱》第一冊後〉、張資平的〈新製礦物學教科書〉、〈高等礦物講義的批評〉等^⑬。與重視科學相一致，創造社對現代化的物質文明表現出深情的嚮往。郭沫若曾把摩托車前的明燈比作二十世紀的太陽神^⑭；把工業化

大都市的繁榮景象形容成「萬籟共鳴的交響樂、自然與人生底婚禮」；把輪船上的煙囪冒出的濃煙比喻為「黑色的牡丹」、「二十世紀的名花」、「近代文明的嚴母」^⑮。

其二是絕對的社會平等。創造社同人不再滿足於英美式的民主政體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機會均等理論。他們所要求的，不僅僅包括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更重要的是在經濟上的平等，他們認為，只有貧富均勻才會帶來真正的平等。郁達夫曾認為當時的社會癥結在於貧富不均：「所謂人類的幸福，由目下的社會狀態看起來，根本問題，就在經濟。當社會組織沒有改善以前，我們的能不能享幸福，簡直可以說就在你一個人有沒有資產。在目下的中國社會裏，最明顯的一件事情，就是有資產的富人少而無資產的窮人多。」^⑯與這種觀念一致，他們對私有制度持否定態度，他們認為私有制度是一切社會不公平的最終根源。1923年郭沫若就聲稱：「藝術的起源本與民眾有密切的攸關；然自私產制度發生，藝術竟為特權階級所獨佔。……二十世紀的今日已經是不許私產制度保存的時候了。」^⑰1924年成仿吾呼籲：「如果要達到民眾藝術的實現，我以為一方面須力求真的藝術之建設；他方面須即將阻礙教育平等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魔宮屠倒！」^⑱

其三是充分的道德完善。正如《洪水》刊名所暗示的那樣，創造社同人所追求的是要把社會的全部罪惡和醜行清洗得乾乾淨淨，世界的每個角落都要開滿「善」的花朵。他們有一個基本思想，認為國家的積弱不振、社會的種種缺陷，很大程度上是緣自道德的淪喪。《創造週報》的發刊詞指責人類的自私、自相斫殺、冥頑、偷

惰；成仿吾則批評中國社會的道德衰亡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說：「世風日靡，正義淪亡以來，人之爭點莫不集中於利，嚮義者反被笑為非迂即愚。……而且現在的中國人，別的技能雖然一點也不發達，只有虛偽與作惡的工夫，直可以誇耀環宇。……大地開遍了惡之花，天空充滿了撒旦之歌頌。」^②他進而呼籲：「我們這龐大的民族，逶迤至今，僅存一具蒼白的死屍了；讓我們全來由這種真勇之養成，恢復我們的道德的生活！」^③正因為他們從道德的層面看取社會現狀、從道德的角度尋求拯救國家民族命運的途徑，致使他們對未來美好社會的描述也就蒙上了一層相當濃厚的道德色彩。

創造社同人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理論家，他們追求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審美和想像的基礎上，「完美無缺」是他們的理想目標。可是，他對烏托邦社會的嚮往，並沒有引起當時知識界的警覺；相反，他們的論敵除了在一些細節的事物上與其糾纏外，並沒有人揭示他們精神深處的這種烏托邦理想的虛妄。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從他們的精神信仰中看到中國歷史上那些曾仰慕和描述過大同社會和道德理想國的知識份子的身影。

三 「自我創造」只是從屬於改造社會的需要

創造社同人在內心裏構築着一個完美無缺的理想社會，對於個體人格則相應地提出了某種規範和要求。在1920年1月18日給宗白華的信中，郭沫若流露出對「自我」人格的深刻懷疑：「我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你恐怕還未十分知道呢，你說我有Lyrical

的天才，我自己卻是不得而知。可是我我自己的人格，確是太壞透了。我覺得比Goldsmith還墮落，比Heine還懊惱，比Baudelaire還頹廢。」^④在同一封信中，他倡導「自我創造」：「我不是個『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現在很想能如Phoenix一般，採集些香木來，把我現有的形骸燒毀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輓歌把他燒毀了去，從那冷淨了的灰裏再生出個『我』來！可是我怕終竟是個幻想罷了！」^⑤兩天後，郭沫若寫成〈鳳凰涅槃〉。這首詩借用神話題材，以一種激烈的情緒和空前的形式重複了上述信中「自我創造」的主題。

如果我們深入分析，便會發現郭沫若倡導「自我創造」的兩個重要前提：其一，精神「自我」可以在某種意義上分解成一個「假我」和一個「真我」，而「真我」往往被「假我」驅逐或者遮蔽；其二，「假我」或者說「舊我」可以徹底地被毀滅以至剩下一個純粹的肉體，「真我」或者「新我」可以完全取代「舊我」而構成真實的「自我」。

郭沫若的「再生之我」或者「自我創造」以後所獲得的「真正的自我」的存在依據在哪裏？簡單地說，人們怎樣才能把它們辨認出來，進而給予它們崇高的地位呢？在創造社同人的精神視野中，國家、民族、一個完美無缺的理想社會是審視和確立「真正自我」的最後依據和標準。郭沫若1922年告誡一位台灣青年：「S君，我們的祖國已不是古時春花爛漫的祖國，我們的祖國只是塚中枯骨的祖國了」，「人只怕是莫有覺悟。一有覺悟之後，便向任何方面都好，我們儘管努力，努力做個『真個的人』罷！」^⑥他認為，只有從拯救國家的思慮中，「覺悟的人」才是「真個的人」，才獲得了真實的自

在1920年1月18日給宗白華的信中，郭沫若流露出對「自我」人格的深刻懷疑。兩天後，郭沫若寫成〈鳳凰涅槃〉，以一種激烈的情緒和空前的形式重複了上述信中「自我創造」的主題。如果我們深入分析，便會發現國家、民族、一個完美無缺的理想社會是審視和確立郭沫若倡的「真正自我」的最後依據和標準。

郭沫若、成仿吾標舉富於集體意味、更具有道德感的崇高目的來敦促他人進行精神上的「自我創造」，以便更好地服務於改造社會、革新現實的目的。郁達夫並不贊成。這暗示了郁達夫有着維護個體私人空間的內在努力，他不願意在「把人看作純粹工具」的思路走得太遠。

我。成仿吾也有同樣的說法，他聲稱：「偉大的精靈的一生，是不斷的傳道與殉教；這些便是他征服一切的過程。我們要時常接觸着偉大的精靈，自己也成為一個。肉體只不過是我們的工具；使用這個工具，為高尚的目的，把一切的障礙征服着前往，只此便是人生的不誤的真諦。」^②也就是說，要成為偉大的精靈，便要發現人生的真諦（即真正的自我），必須把肉體看作一個工具（徹底的摧毀精神上的「舊我」），然後歸附於高尚的目的（在成文中同意於「明道救世」）——亦即無條件地拯救國家民族，作全身心的皈依。

創造社同人所追求的「真實自我」，實質上是一個比個人更「高大」、更廣泛的東西，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完美無缺的理想社會」的化身，而個人只是這個化身的一份子、一個因素。要獲得這種「真正的自我」，還意味着一種具有質的飛躍意義的「精神解放」，意味着享有一份「更高層次的自由」^③。創造社「自我創造」的觀念一旦步入實踐的領域，其結果是個人空間被侵佔、自由受約束。既然每個人都有一個有待挖掘的真正的自我，而且人人都可以通過思考或者教育找到那個真正的自我，那麼對那些達到一定智慧和道德水平的人來說，他們就會自覺追求「真正自我」的實現。相反，如果大多數民眾還處於「蒙昧」狀態，那麼，那些自認為已發現「真正自我」、「人生真諦」的人，亦即那些自認為擁有打開通向未來「美好的理想社會」大門之鑰匙的人，就有充分的理由去啟發、甚至強制民眾，以使他們獲得「真正的自我」，從而忽視他們的實際願望和基本需求。

後期創造社要求作家徹底清除自身的小資產階級根性，達到「無私無

我」的精神境界，這便是他們「自我創造」的思想發展到極致的表現。李初梨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一文中宣稱：「假若他真是『為革命而文學』的一個，他就應該乾乾淨淨地把從來他所有一切布爾喬亞意德沃羅基完全克服，牢牢地把握着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戰鬥的唯物論，唯物的辯證法。」^④郭沫若則要求文藝青年「當一個留聲機器——這是文藝青年們最好的信條。你們不要以為這是太容易了，這兒有幾個必要的信條：第一，要你接近那種聲音；第二，要你無我；第三，要你能活動」^⑤。成仿吾呼籲作家「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然後「努力獲得階級意識」^⑥。他們都舉着一個富於集體意味、更具有道德感的崇高目的來敦促他人進行精神上的「自我創造」，以便更好地服務於改造社會、革新現實的目的。

郁達夫後來脫離創造社，其原由可謂複雜難辨，但有點可以肯定，郁達夫不贊成郭、成等人後期的主要觀點，特別是上面一段提到的那些主張。他認為那些本身不是「無產階級」的人，不可能獲得無產階級的自覺意識^⑦。儘管郁達夫提出這一觀點後並沒有進行具有說服力的理論分析，也沒有着力去揭示其同人觀點的精神實質，他只是覺察出了「徹底的換腦筋」的不可能，這暗示了郁達夫有着維護個體私人空間的內在努力，他不願意放棄個人的獨立品格，不願意在「把人看作純粹工具」的思路走得太遠。

五四時期，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心裏都無法捨棄對現實政治的思考以及對未來美好社會的嚮往。但是其中像魯迅、郁達夫等一些人，他們在關懷現實社會的同時，還保持着對維護個人獨立人格的警覺。可以說，他們在

維護個人與拯救社會之間保持着某種平衡。1931年，魯迅在一次演講中述評了創造社的發展歷程，他尖銳地指出創造社所說的「突變」之不可能：「……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稱突變過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家，不久就突變回去了。」^⑩魯迅並沒有深入挖掘創造社同人「突變」一說的精神根源，但他們要求作家做所謂的「突變」（亦即倡導清洗作家個人的思想空間）則遭到了魯迅的尖銳批評。顯然，相對於五四時期知識份子走不出「拯民濟世」的精神傳統，創造社則在此基礎上走上了一個極端，而五四時期知識界對這種危害個體獨立人格的極端思想是有警覺的。

註釋

- ① 〈創造日·宣言〉，《中華新報·創造日》，1923年7月21日。
- ② 當時泛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諸種理論科學。
- ③ 以上參閱《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頁46-48。以下凡引《郭沫若全集》，皆屬於這一版本。
- ④ 周全平：〈撒但的工程〉，《洪水》，第1期，1924年8月20日。
- ⑤ 郁達夫：〈沉淪〉，載《郁達夫文集》，第一卷（香港：三聯書店，1982），頁53。
- ⑥ 郭沫若：〈月蝕〉，《創造週報》，第18號，1923年9月9日。
- ⑦ 成仿吾：〈灰色的鳥〉，《創造季刊》，第1卷第3期，1922年11月。
- ⑧ 《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一卷，頁70-71。
- ⑨ 參閱王富仁：〈創造社與中國現代社會的青年文化〉，載《靈魂的掙扎》（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頁170。
- ⑩ 以上皆引郭沫若〈鳳凰涅槃〉，載《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一卷，頁34。

- ⑪ 成仿吾：〈國學運動的我見〉，《創造週報》，第28號，1923年11月18日。
- ⑫ 郭沫若：〈王陽明禮智〉，載《文藝論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頁51。
- ⑬ 參見成仿吾：〈編輯縱談〉，《創造季刊》，第1卷第4號，1923年3月。
- ⑭ 參見《中華新報·創造日》，第4、5、10、11期。
- ⑮ 郭沫若：〈日出〉，載《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一卷，頁62。
- ⑯ 郭沫若：〈筆立山頭展望〉，載《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一卷，頁68。
- ⑰⑱ 郁達夫：〈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文學〉，《洪水》，第3卷第26期，1927年2月1日。
- ⑲ 郭沫若：〈中華全國藝術協會宣言〉，《創造週報》，第22號，1923年10月7日。
- ⑳ 成仿吾：〈民眾藝術〉，《創造週報》，第47號，1924年4月5日。
- ㉑㉒ 成仿吾：〈士氣的提倡〉，《創造週報》，第4號，1923年6月3日。
- ㉓ 成仿吾：〈新的修養〉，《創造週報》，第6號，1923年6月16日。
- ㉔㉕ 郭沫若：〈郭沫若致宗白華〉，《時事新報·學燈》，1920年2月1日。
- ㉖ 郭沫若：〈反響之反響〉，《創造季刊》，第1卷第3期，1922年11月25日。
- ㉗ 柏林：〈兩種自由概念〉，載《市場邏輯與國家觀念》（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212-13。
- ㉘ 《文化批判》，第2號，1928年2月15日。
- ㉙ 郭沫若：〈英雄樹〉，《創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
- ㉚ 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創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
- ㉛ 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載《魯迅全集·二心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頁287。